

浅析西汉儒学的发展与影响

吕亚丽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 儒学历经先秦产生发展阶段,在汉代获得独尊地位,并逐渐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是其顺应了历史发展并通过自我理论的不完善以及统治者的权威推行和提倡。本文旨在通过儒学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的三个阶段来探究西汉儒学在儒生的不断努力下取得发展与影响。

[关键词] 西汉;儒学;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 D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198(2015)04-0085-03

DOI:10.13775/j.cnki.cn61-1472/g4.2015.04.039

先秦时期“儒学”已成为和“墨学”并立的显学,当时就有“非儒即墨”之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从产生到发展,经过孔子及其门人弟子不断充实完善,儒学渐拥有其自身理论体系,但在当时它毕竟只是百家之一,并没有成为中国官方正统学说。面对战国以来“礼崩乐坏”诸侯征伐混战社会现实的冲击,以及秦朝“焚书坑儒”、“以法为教”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儒学发展呈现式微之势,对社会影响很小。及至西汉,儒学才逐渐发展达到顶峰,一跃成为中国封建专制国家之统治思想。西汉儒生对君主之影响及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君主大力提倡儒学是其发展的推动力。

一、汉初到武帝时期儒学发展

汉朝初建时期,经济凋弊,社会混乱,百废待兴。因着诸王征伐,连年战火,使百姓的生活破败不堪。汉初的统治者意识到应以修养生息,恢复社会安定为第一要务。因此,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黄老之学以它独特的“清静”、“无为”思想成为了统治者治理天下的首选理论。“黄老无为”思想的运用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形成了汉初“文景之治”盛极一时的局面。这对儒学的发展形成了强势的冲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汉初儒生并没有放弃,一直在伺机寻找自我发展的途径。他们反思自家思想的弊病,走下神坛,与现实结合。首先从皇权角度赢得统治者的青睐,然后他们潜心研究各家学说,采用兼收并蓄的态度构筑和充实起自己理论框架,以此来宏扬儒学“货于帝王家”。

儒学在秦朝“焚书坑儒”后受到了严重打击,但社会中仍然有儒生研习儒学,为儒学之发展保留了学术的。例如鲁地诸儒讲诵习礼乐,修其经艺。西汉初年,亦不缺乏儒生。一大批以陆贾、叔孙通、贾谊、申培公等为代表的儒生活跃在政治生活当中。据记载,叔孙通以故秦博士的身份

投刘邦后,遂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为刘邦制礼作乐。还有在民间基层群众中,也不缺乏儒学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以上行为都为汉初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儒学上升为统治集团的正统学说地位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现实可能性。

还有儒学自身的人本主义思想,如孔孟要求统治者以仁爱道德治理天下,实行仁政德治等,符合社会中民众对统治者的理想要求,因此儒学在民众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加上黄老之学本就主张“无为而治”,对其他思想管制不甚严格,所以先秦以来的各家学说基本上都得到一定的恢复与发展。而且儒学在逐步转变成一个包容开放的学说,在融合各家之长后儒家学说就有了广泛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一)陆贾:从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第一步

陆贾,楚国人,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为汉初较有影响力的儒生。在刘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他“客以高祖以定天下”、“居左右,常使诸侯”^[1]p4196,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极力推崇孔子学说,认为儒家思想为万世之大统,可以上正其君,下安其民。基本是按照孔孟的思路来谈仁政德治。但是,刘邦在打天下是极不好儒,史称“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2]p4187。陆贾为改变刘邦对儒生的看法,经常以《诗》、《书》的道理,给刘邦讲如何治国平天下。刘邦命他“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于是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刘邦“未尝不称善”^[3]p44200-4201遂著成《新语》,总结秦亡教训。在陆贾的劝说下,刘邦的态度有所改变,后来也殷勤祭祀孔子,从而初步扩大儒学的发展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此时陆贾的思想已不仅仅是纯儒学,而是融入了道家思想,在汉初特定的

[收稿日期] 2015-05-14

[作者简介] 吕亚丽(1991-),女,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背景环境里休养生息为第一要务,而道家思想极盛,并且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儒学想要发展就必须吸收道家精华,满足统治者与社会的需要。因此陆家的学说里不仅有儒家的主体思想,还有道家黄老之学的色彩。

(二)贾谊:“以礼而治”,进一步推动儒学进程

贾谊,文帝时期才华横溢的儒生,被“召以为博士”,“岁中至太中大夫”。他的思想受荀子的影响很大,是西汉前期荀子后学的重要代表。他认为治国安民光靠“无为而治”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所作为,而儒学传统主张礼治,于是提出仁政德治。著有《新书》,《汉书》卷四八《贾谊传》所载《治安策》系班固“概括,删削”《新书》而成^[4]。文帝好刑名之学,并不热衷于儒学。贾谊从维护皇权安定局势入手,力主“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5],但文帝并没采纳。他没有放弃,认为文帝应“始治天下”,进而必须废除承秦而来的“法治”政策;改行儒家所倡导的“德教”。贾谊所谓的“德教”是“以礼而治”。所谓“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亲和。”。但由于,朝廷大臣多数反对,文帝“谦让未遑”,贾谊的主张大多被束之高阁^[6],后受到排挤,终身不用。虽被贬,却提高了儒学的影响。从贾谊任景帝之弟梁怀王太傅可以看出,经过贾谊的努力,文帝也并非完全排斥儒学,只是儒学的发展还不成熟而已。

(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其积极作用在于复苏了社会经济,民力得到恢复发展,并且出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的局面。然而任何统治阶级在政治上都不可能永远“清静无为”。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富庶,国力提升,很多重大问题都出现了。例如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以及社会风俗教化,都是有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出现离心离德现象“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互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乡曲”^[7]。尤其是地方诸王势力的膨胀,直接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甚至汉王朝的安危存亡。而黄老之学并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汉武帝一直想要放开手脚施展他的雄才大略,他在汉初70年积累起来的雄厚物质势力的基础之上,再也不愿像文、景那样“恭俭无为”了。他要的是大权独揽,拥有皇帝的权威,以建立“大一统”的汉朝帝国。因此,他在寻求一种学说强化这种权威,为他的霸业找到合理的依据。对于儒学的发展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大展宏图的机会。而董仲舒适时的掌握了这次机会。

董仲舒,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儒学家,主要著作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他根据汉武帝的需求,提出系统理论,继承汉初儒学传统,汲取道家理论精华,融汇阴阳五行观念,收纳法治的合理因素,终于构建了一个合“天地”、“阴阳”、“有为”诸家学说于儒家三纲五常的大一统理论。从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儒学思想体系。将阴阳学

说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始于董仲舒,故班固说他“始推阴阳,为儒家宗”^[8]。董仲舒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学道德观念;针对土地兼并的社会现实,并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力行孝道。

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方式都无法脱离文化。文化对制度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不管制度的产生采取何种方式,文化始终在制度生成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且,制度合法性和认同性的获得也依赖于文化的支撑^[9]p37-38。董仲舒的君权神授思想:“受君之命,天意之所予也。”^[10]p286,“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11]p319,建立了天——君——民的神学体系。天不仅创造了人类,还为人类安排了君,君民关系是天定。君上承天意,下传天命,不可怀疑,不可动摇,从而确立了君主在人间的权威。这种思想为汉武帝加强君权,实行大一统,找到了合理化依据,披上神学外衣。进一步论证了君权的神圣的合法性,非常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让百姓心甘情愿存有臣服之心,不轻易反叛。社会伦理道德方面,董仲舒用阴阳论证“三纲”的圣神不可动摇,强烈突出了“君、父、父”的尊严,加强“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三纲五常”成为社会道德准绳,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君臣父子之礼,贵贱长幼之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董仲舒的一系列儒家学说,让汉武帝看到了诸多有益之处。于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正式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独尊地位。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官方正统学说、中国文化的“主流”。在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正式创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因此,儒学为正统的教育制度正式确立。

二、汉代儒学的影响

从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制度,反过来都以自己现实的存在方式将自己所体现的文化传统或所依据的文化观念继续加以推广,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强化所以文化观念并内化为每个人的心里作用^{[12]p24}。

儒学的大一统思想满足了汉武帝抵抗匈奴、扩张帝国版图的愿望,减少了战争阻力,一改过去对强敌的忍让态度而采取强硬立场,几次派遣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去征战匈奴,彻底解决了匈奴对边境的袭扰,并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众少数民族依附汉朝等。三纲五常明确了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使百姓产生了向心力,百姓以儒学为信仰,形成了一种不是宗教胜似宗教的影响力。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各阶层统治者亲身践行儒学理念,对儒学进行了权威推行与提倡,使儒学运用于政治生活当中。(下转第93页)

的委托赴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建党情况,并就中共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问题与远东局代表进行了会谈,还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16]。由此可知,杨明斋是最早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国人之一,并加强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沟通与联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杨明斋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中共‘一大’之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12]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杨明斋出席了大会,并对制定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起了积极作用。”^[12]总之,杨明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后,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杨明斋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与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有相通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或独特之处。目前,学界对杨明斋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比较研究略有忽视。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对深入了解杨明斋早期的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发展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余世诚.关于杨明斋生平事迹的调查[J].齐鲁学刊,1983,4.
- [2] 苗体君.鲜为人知的杨明斋[J].党史文汇,2010,7.
- [3] 阎化川,李丹莹.杨明斋及其文化观的再研究[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2.
- [4] 余世诚.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搞清了杨明斋的下落[J].中共党史研究,1989,4.
- [5] 徐及之.杨明斋1936年病逝于苏联托木斯克[J].中共党史研究,1999,6.
- [6] 余世诚.杨明斋在苏联的最后岁月[J].百年潮,2001,7.
- [7] 杨宗文,李玉晓.杨明斋资料的新发现[J].中共党史研究,1995,2.
- [8] 刘辉.五四后期文化论争的重要成果——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试探[J].北京党史,1995,3.
- [9] 亓静,王玉瑾.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探析[J].红广角,2013,10.
- [10] 刘黎红.评杨明斋对‘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批判[J].广东社会科学,2002,4.
- [11] 马宏.杨明斋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历史地位[J].中共党史研究,1999,1.
- [12] 舒志超.万里投荒 一身是胆——记华侨杨明斋在中共创建中起的桥梁作用[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9.
- [13] 梅枫.建党时期的杨明斋[J].历史教学,1983,6.
- [14] 李小玺,寇跃灵.论杨明斋为我国共青团的建立做出的贡献[J].兰台世界,2014,7.
- [15] 慈丹,刘磊.受共产国际委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杨明斋[J].兰台内外,2001,4.

(上接第86页)它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的统治权力由皇亲国戚、世家贵族、功臣把持的局面,使真正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得以参政,由此提高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因此成为官吏选拔的标准。用儒学干预经济,发展均田制,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儒学在官府的鼓励和扶持下迅速繁荣起来,“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13]p3620-3621。这一方面促成了官吏群体的儒学化,提高了官阶仕子崇尚儒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社会上攻读儒学经典蔚然成风,更是谋取官职的一种手段,即“终南捷径”^[14]。从此,儒家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普及并成为汉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以至于到王莽新政时期,对社会的复古改制都源于对儒学的痴迷。汉代太学的设立,表明国家不仅有了传授学术的官学,也引发了民间办学的热潮,推动文化传播。

然而,儒学随带来的不仅仅是积极的一面,它还包含着消极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利于学术思想的繁荣。因为它打破了各种学术平等发展的态势,结束了各家学说自由争鸣的局面,对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儒学只重视理论研究,不重视科学知识的研究学习,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和参政意向,“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被逐步歪曲,导致士人知识分子读书严重功利化。这一现象使得思想意识僵化,没有创新与实际操作的能力。

西汉儒学经过儒生的不断努力最终确立独尊地位,成为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汉朝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到了现代,儒学仍然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如今,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发达,社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然而伴随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信仰缺失,崇尚拜金,社会风尚越来越败坏。这不仅影响到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损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

参考文献

- [1] [2][3]司马迁.史记会注考证[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
- [4] 魏建功,阴法鲁,吴竞存等.关于贾谊《新书》真伪问题的探索[M].北京大学学报,1961,5.
- [5][6][8]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 [7] 张维青,高毅青.中国文化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 [9][12] 任洁.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与制度变迁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10][11]董仲舒(著),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1.